

论体育赛事与城市发展

于永慧¹, 王越平², 程维峰³

(1.华南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2.中山大学 社会学系, 广东 广州 510275;
3.长江大学 体育学院, 湖北 荆州 434023)

摘 要: 探讨体育赛事与城市发展的理论逻辑, 并以广州亚运会作实证分析, 论证体育赛事成为城市发展的催化剂, 但在不同时间、空间、主体条件下, 它发挥的功能与实施效果不同。时间上从国际政治向地方治理、区域经济与社会文化演变; 空间上有英国早期工业化的城市复兴、美国工业化高级阶段的城市繁荣、德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城市社区共同体的形成等; 行动主体上, 从国家到地方, 地方政府的角色从城市管理到城市管理与城市运营并重。2010年广州亚运会是珠三角区域城市群塑造的催化剂, 广州在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特定的中国区域城市中心、特定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之下, 凭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区域中心城市塑造、政府社会管理与城市经营相辅相成的运作机制而完成, 相比较而言, 其社会效益高于经济效益。

关键词: 体育社会学; 体育赛事; 城市发展; 广州亚运会

中图分类号: G8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11)05-0025-06

On sports games and city development

YU Yong-hui¹, WANG Yue-ping², CHENG Wei-feng³

(1.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2.Department of Sociology,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3.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Yangtze University, Jinzhou 434023, China)

Abstract: The author probed into the theoretical logic between sports games and city development, and by taking the Guangzhou Asian Games for example, analyzed that sports games have become catalysts for city development, but the functions they exerted are different from implementation result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different time, space or subject. In terms of time, there was the evolution from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o local governance, regional economy and social culture; in terms of space, there were early industrialized city renaissance in Britain, industrialized city prosperity at a higher stag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formation of city communities in the economic transition period in Germany, etc.; in terms of the subject of action, there were the change from country to local area, and the change of the role of local governments from city management to equally important city management and city operation. The Guangzhou Asian Games in 2010 was a catalyst for the shaping of citie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completed by Guangzhou at a specific stag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 specific regional city center in China, under a specific relation between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 by depending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regional central city shaping, and the government operating mechanism in which social management and city operation interact favorably. Comparatively, its social efficiency is higher than its economic efficiency.

Key words: sport sociology; sports games; city development; Guangzhou Asian Games

收稿日期: 2011-01-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体育赛事与城市治理”(11CTY011)。

作者简介: 于永慧(1977-), 女, 副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 体育社会学。

近年来,国际体育赛事在全球范围内升温,奥运会、世界杯、亚运会、世锦赛等各类国际体育赛事成为人们喜闻乐道的谈话主题,也构成体育参与的主要形式之一,并日渐演变为城市间竞争的主旋律。想必世人对 2004 年雅典奥运会记忆犹新,它给世人留下的印象是古希腊灿烂的文明,并带动希腊旅游、文化等全方位的提升,当然,也给希腊人民留下沉重的债务。2008 年北京奥运会,全国人民欢庆的时候,更多的收益要数北京市民,便利的交通、高端的场馆、普及的体育文化等。2010 年世界杯给非洲人民以欢愉与信心;2010 年广州亚运会通过媒体改变广州形象,通过市民参与增强市民认同感,并在场馆建设、赛事组织等方面突破完全由政府主导的运作模式,在全球视野下,打造广州新形象、创造广州新生活。

国际体育赛事从欧美发达国家或地区,逐步扩展到亚洲、非洲等欠发达或落后国家,现代体育经历了早期特定阶层的休闲娱乐、二战前后的国际政治较量、工业化高级阶段之后的商业运作与城市运营,国际体育赛事的举办权从国家向区域或城市转变,行动主体从政府主导逐步过渡到政府、企业与民间组织相结合,地方政府作为城市发展的行动主体,逐步从政府管理型过渡到政府运营型。国际体育赛事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日益受到关注,它对提高市民认同感、树立城市品牌、促进经济增长、提高政策统合度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在不同时间、不同人群、不同地区的影响是有差别的,但整体上又是相互结合的^[1]。

本研究提出的问题是体育赛事与城市发展的关系是什么?广州经验如何?具体分为特定的时间,体育赛事推动城市发展的功能不同;特定的空间,对于不同国家、区域或城市,通过体育赛事推动城市发展的责任不同;城市发展的行动主体不同,其运行机制有何差异,这种差异的原因何在;广州亚运会推动城市发展的运作逻辑是什么等问题进行讨论。

1 从时间维度看体育赛事与城市发展

现代体育、国际体育赛事源于早期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技术进步、工业生产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极大转变,有了经济支撑,休闲娱乐成为西方人追求的时尚。但是,当一部分早期工业化的城市进入衰退渴望复兴,体育赛事与其它博览会、展览会等一样,成为城市复兴的手段之一。而对于一些进入工业化后期,制造业外迁、现代服务业支撑的城市,体育被视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希望以此带动就业、旅游、消费等。

早期国际体育赛事的举办权争夺主要源于国家之

间,以奥运会为例,负载了较多的国际政治关系,国家以举办奥运会为契机向世界展示综合国力、国家意识形态和民族文化传播。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80 年代中期起,奥运会与政治体制的较量、国家主权及声望交织在一起,出现大大小小的政治冲突。在这一时期,奥运会举办国的政治企图也日趋鲜明,将奥运会作为追求国家政治利益,实现国家政治目标的工具^[2]。东京奥运会给二战后的日本以重建国际地位的机会,1988 年汉城奥运会的举办推动韩国政治民主的进程,奠定其在国际政治的地位。

19 世纪 80 年代,美国的体育活动参与发生转变,参与者以富人、男性为主,运动项目以马球、游艇和网球为主^[3]。社会阶层与性别限制了体育活动参与的规模,但在随后的几十年,美国体育以职业化为载体,进行商业化扩展,通过扩大体育参与而争取更多消费者成为体育职业俱乐部的根本目的,而体育赛事则是目标达成的主要手段。

体育赛事的繁荣与 20 世纪 80、90 年代的城市发展有关,发达国家的大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制造业逐步外迁,商业逐步繁荣,而体育的职业化是商业化的产物,是第三产业的主要内容,它已经成为一种新经济形态的工具,体育赛事作为繁荣城市商业的重要手段之一。美国、西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地方政府纷纷争夺体育赛事的举办权,以期带动城市经济的繁荣^[4]。此外,地方政府热衷举办体育赛事的原因还来自两方面的社会需求:一是城市环境日益得到关注,体育赛事的举办可以帮助提升城市形象,影响城市的未来发展;二是体育赛事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提供良好的发展机会^[5]。这类工业化城市被描述为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后现代“狂热城市”,以娱乐休闲、追逐梦想、城市营销和繁荣商业为特征的城市^[6]。这类城市空间也逐步转向文化商品再造,体育是文化商品的一种,它越来越成为城市提升竞争力的工具^[7]。以 20 世纪的美国为例,很多运动员与企业家试图把体育从奢侈性的休闲转为美国大众化的文化,扩大体育参与,吸引更多的消费者,获得更多的商机^[8]。美国 4 大联盟的职业体育比赛、英国超级足球联赛、足球世界杯等赛事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之一。工业化带来的经济进步为城市竞争提供基础条件,地方政府作为城市的管理者、经营者,利用体育赛事扩大城市影响力、提高城市关注度、塑造城市形象、增强市民认同。体育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体育文化更加普及,体育参与群体更加广泛,但国家或地区利用体育塑造大国意识形态、显示本国或本地区政策的优越性等方面的政治功能也并未减弱^[9]。

在 OECD(经合组织)国家,①体育是发展经济的一种手段,体育产业占 GDP 的比重平均为 3%;体育文化构成居民生活方式的一部分,2/3 的人通过电视观看了 1996 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的部分节目^[9];体育与政治的关系从国际政治走向区域政治,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策工具^[10]。

城市争取各类体育赛事的举办权,体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意义更多转移到以城市为中心的治理机制完善上^[11]。争取体育赛事的举办权形成城市之间的竞争^[12]。很多学者讨论了体育赛事举办、体育设施建设与都市经济增长的关系^[13-17]。体育赛事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意义的讨论是积极与消极共存,但是经济意义是东道主城市的主要推动力^[18]。体育赛事的积极意义包括对就业、消费的带动^[19]。体育作为社会福利性的公共服务的作用逐步减弱,取而代之的是地方政府热衷的城市营销,通过体育赛事,兴建体育场馆带动经济增长,促进旅游,带动对内投资^[9]。

时间维度上,体育的功能演变过程:一是政治因素并未减弱,但形式发生变化;内容从政治霸权演变为政治交流;行动主体从国家演变为地方;国家与地方的关系上“国家政治工具”走向“地方治理工具”。二是经济因素增加,内容不断丰富。从单纯的体育经济(门票、赞助、转播权)演变为多元的相关经济体,旅游市场的开发、劳动力市场的带动、商业氛围的营造、基础设施投资的刺激等。三是社会文化交流频繁,市民认同提高。比赛类型西方的现代体育与东方的养生体育逐步融合;参与主体从少数专业人士到市民、志愿者、媒体多方主体转变;社区认同从国家认同逐步到区域(或城市)认同;效益评价从偏重社会或经济效益过渡到社会与经济效益并存。

2 从空间维度看体育赛事与城市发展

体育赛事被发达国家所追逐,逐步扩展到发展中国家,上述不同时间条件下,它的功能逐步演化,较为明显的转变是从“国家或民族政治”逐步走向“区域或城市治理”,但是城市治理的机制有所差别,这里以典型的城市治理模式用于解释空间视野下的体育赛事功能发挥机制。

1)英国的城市复兴。

英国第 2 轮的体育投资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一些城市制定了以体育发展为导向的区域和经济发展的促进计划,并带动城市房地产业的繁荣^[20]。英国的大部分工业城市追随“体育推动城市”的发展战略,并制定城市发展计划,举办各种体育赛事以吸引更多的参观者来到城市,并以此繁荣早期衰落工业化城市

的^[21]。体育赛事的主要推动力是经济复苏,随着很多中心城市的衰退(如英国的格拉斯哥、谢菲尔德、曼切斯特),人们开始期望体育赛事能够带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大型体育设施的兴建^[10]。英国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产业结构调整,制造业外迁,中心城市的人口扩散到周边,体育赛事成为聚集人口、繁荣商业的主要手段之一。

2)美国的城市繁荣。

20 世纪 70、80 年代,体育赛事与大型文化、商业中心一样,成为城市繁荣的重要工具,体育场馆建设营造城市中心,并被列入城市发展计划,翻修或者新建的体育场馆创造更多体育赛事机会,并吸引专业运动队落户城市。体育赛事推动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地方政府为了争取美国 4 大体育职业联盟的赛事冠名权,争相建设豪华的体育场馆及其配套设施,以期获得城市繁荣。20 世纪 90 年代,30 个大型体育场馆建设计划,有 1/3 是职业体育的基础设施,总产值约超过 9 亿美元^[22]。体育赛事依托体育场馆带动消费及相关产业的发展,55%源于公共投资,20 世纪仅体育联盟的场馆经费已超 20 亿美元,15 亿美元是地方政府的公共投资^[23]。NFL、NBA、MLB、NHL 和 MLS 联盟中,②66%的运动队在这类场馆举行职业体育联赛^[24]。地方政府不惜用公共资金建设体育设施,用以吸引更多的职业运动员和球队冠名权,促进城市的商业繁荣^[25]。地方政府举办体育比赛、建设体育场馆、扩大社会参与,大型体育场馆是城市名片,规模越来越大,设计越来越豪华,城市之间乐此不疲地进行体育场馆建设的比拼^[26]。体育赛事的产业链较长,是城市第三产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带动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劳动就业,为城市旅游、会展等产业发展提供新的发展机会。

(3)德国的城市社区。

德国的体育赛事运营充分发挥志愿者、政府公共服务部门、私人团体或个人等各方行动主体力量,扩大体育参与,地方政府提供体育公共服务,并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承办国际体育比赛的主要目的在于体育文化的交流,协助社会各行动主体办好国内的各项体育赛事,财政上保护弱势群体的体育权利,主要体现在活动的开展与体育设施的建设上,尊重地方自主制订体育发展规划,自主举办各类体育活动,形成和谐社区^[27]。德国汉堡是大型体育赛事的集中地,体育比赛是本地居民的节日庆典,如汉堡网球大师赛、高尔夫巡回赛、曲棍球巡回赛、沙滩排球赛、马拉松赛和汉堡自行车赛、世界杯精英赛等赛事都固定在此举行,赛事现场也成为汉堡居民交往的重要场所之一。

体育是人们休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德国体育联盟的目标是通过体育比赛促进大众体育的普及,有利于城市社区发展^[29]。在德国,体育俱乐部的社区生活是市民生活的重要内容,这些体育俱乐部以自愿者组织为主,并成为德国人社会生活的重要特征之一^[29]。体育赛事促进社区形成,体育俱乐部则是重要场所。

3 从行动主体维度看体育赛事与城市发展

1) 公共管理角色。

体育比赛是城市发展的催化剂,地方政府可获取超出赛事本身的其它更多收益,如公共设施建设^[30]。英国体育赛事的运作模式以国家公共资金或公共-私人合作伙伴(简称“PPP模式”)为主,各级地方政府无权决定或建议地方税收的使用,但举办大型体育赛事则例外,它能够获得上级政府的财政支持并准许使用地方税收^[31]。这与英国社会化为主导的体育管理体制有关,各联邦政府体育管理的主动权较小,体育公共服务不足,城市举办体育赛事能够促进资金与职权的下放,并带动本地区的基础设施投入,完善公共服务,促进城市复兴,获取更多管理权。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之后,英国成立文化、媒体与体育部,吸纳各联邦政府共同参与体育的治理,设置专门机构管理体育,加强竞技体育的规划和政策引导,提高体育公共服务质量,中央政府的管理权力下放,联邦政府的参与程度加大,资金投入加大。联邦政府体育与休闲的支出大约每年1亿英镑,50%以上用于扩大体育参与、改善体育服务、争取体育成绩。1998-2002年期间,体育管理的方向以创建活力学校、动感体育、活跃社区为目标^[31]。

体育赛事是媒体事件,可以提高市民的城市认同与政策认知、改变城市的社会环境、构建积极的生活方式、减少社会冲突。同时,体育赛事也是文化盛事,扩大民众参与、提高国际地位^[32]。

从申办到举行体育赛事的全过程,设立组织、申办决议、场馆建设、基础设施建设、赛事运作、广告宣传、沟通公共关系等都在考验地方政府的管理智慧。

2) 城市运营角色。

地方政府是国际体育赛事竞争的行动主体之一,源于地方政府从管理者到经营者的角色转变,地方政府充当企业家的角色,目标是促进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30]。这种角色转变被描述为“市政资本主义”的新时期,公共部门逐步从城市发展的“推动者”转为“运营者”^[33]。美国的地方政府自主权较大,财政相对独立,提高城市运营效率是城市竞争的重要指标,也是政客获取选票的重要手段之一。地方政府、俱乐部老

板、运动员、媒体等行动主体联合,宣传体育对城市的积极影响,尤其是经济效益,城市运营者制定体育赛事的经济发展规划,实施相关的支持性政策。

3) 城市管理与城市运营的融合。

地方政府是体育赛事的主导组织者,它必须担当城市管理者的角色,在赛事筹备与举办期间,它要对城市交通、基础设施、观光旅游、新闻媒体、环境污染、市民安全等问题负责。地方政府热衷体育比赛的原因是综合性的:直接的经济收益;吸引或留住赛事参与者(如运动员、观众);吸引旅游者和投资者;发展基础设施,提高城市竞争力(如文化旅游);提高市民自豪感和认同感,促进社会和谐;形成体育生活方式,改善社会健康;加强私人与公共部门的联系;提高体育的本质认同;利用自愿者积累社会资本^[34]。体育赛事越来越凸显出地方政府既是管理者又是运营者的双重角色。

4 从广州亚运会看体育赛事与城市发展

1)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催化剂。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制造业从“三来一补”到“世界加工厂”,外资经济与民营经济互动发展,制造业获得大幅提升,产品远销全世界。广州作为广东快速工业化的城市之一,第二产业的比重大幅提升,率先进入工业化的高级阶段,2009年,人均GDP达到13006美元,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7610元(人民币)，“十一五”期间,广州市GDP、三种产业的平均增速分别为:GDP增长13.6%;第一产业为1.2%;工业为13.4%;第三产业为14.7。

广东省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新一轮发展战略中,广州市、深圳市、惠州市是珠三角一体化发展规划中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与战略新兴产业的主导城市。国际经验表明,发展体育产业是带动第三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尤其是现代服务业、体育赛事产业在拉动基础设施投资,带动旅游产业、高端电子信息产业、房地产业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因此,广州亚运会作为世界级的大型体育赛事成为广州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催化剂。

2) 区域城市中心的催化剂。

北京、上海、广州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风向标。北京是国际政治文化中心,1990年的北京亚运会、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足以验证体育赛事的国际政治影响力,当然,体育大赛给北京城的发展留下标志性建筑、城市功能分区重新定位、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高质量的城市公共服务。上海世博会的诸多世界之最,给上海城带来经济、社会、文化的新一轮的繁荣。

广州是珠三角城市群的核心,2010年亚运会为珠三角区域中心城市的定位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城市群对区域经济的拉动将是各区域“十二五规划”期间的重要建设内容之一,广州亚运会是提高区域竞争力,宣传珠三角区域新形象的重要平台。

广东省政府积极推动珠三角一体化规划,其中广州市被定位为现代服务业的中心城市,“广佛肇(广州、佛山、肇庆)”是珠三角一体化中的一个城市圈,通过亚运会率先完成城市圈内的一体化,进一步加快与其它两个城市圈的联动(“珠中江”即珠海、中山和江门;“莞深惠”即东莞、深圳和惠州),同时加快“粤港澳一体化”的进程。2012年的深圳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香港申办2023年亚运会的筹备工作,彰显了体育赛事对区域中心城市形成的重要作用。

3)城市治理主体的催化剂。

与其它国家不同,中国特殊的财政分税体制,城市拥有地方财政的支配权,但大项目的建设受制于中央政府的监督,地铁、机场、高速公路等均属于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必须经中央政府审批才能实施,而大型体育赛事能够促成这些项目的批准、完成。交通的完善、基础设施的建设,便于广州形象的塑造,提高民众对政府政策的认同度,维护了地方政府作为城市管理者的形象。

广州亚运会筹办过程中,广州市政府通过市区功能区的重新规划,树立以海心沙为中心的中央商务区、番禺为中心的新型居住区、荔枝湾的河涌整治改善旧城区环境。根据城市发展的整体规划,结合体育场馆的建设,形成“两城两中心”(亚运城、大学城,奥林匹克中心、天河体育中心)和老城区5大场馆群,以及城市景观的总体规划。城市的功能定位层次清晰、有序,有利于城市功能定位的整体提升。旧城改造,更好地解决早期工业化遗留的无序建设问题;CBD旨在吸引高端投资者,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大力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金融、会展、信息技术等)的繁荣,并带动新兴产业;新型居住区的打造,房地产业获得提升,突破早期城市化中心城区空间不足的限制。

相对于1990年的北京亚运会,以及各个城市举办的全运会,2010年广州亚运会加大了企业赞助、社会捐助的比例,但是仅仅从单个体育赛事的经济效益计算,可能入不敷出。但是,广州亚运会开幕式打破常态的岭南文化营造、城市形象展示、市民从淡定到积极参与的态度转变,使广州亚运会获得社会效益大于经济效益。因此,广东省政府、广州市政府既是城市管理者,又是城市运营者。

体育赛事可以成为城市发展的催化剂,但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不同行动主体下,体育赛事发挥作用的机制不同。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地方政府始终把大型活动看作城市发展的催化剂,乐此不疲地积极申办、承办大型活动,理论界使用“地方政府即是企业家”的观点解释中国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动力。但是,地方政府与企业家不同,他们受到自下而上的民众压力,如果单方面追求经济利益忽视社会效益必然会带来执政的合法性难题。因此,地方政府要考虑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角色转型是必须的,即“城市经营者”转向“城市治理者”,大型活动考验他们的城市治理能力,即如何充分调动多方资源,协调多方行动主体,共同推动城市经济与社会的同步发展。

注释:

- ①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即OECD)包括34个市场经济民主体的政府(德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奥地利、澳大利亚、日本等)共同工作,应对全球化世界经济带来的对经济、社会、环境、以及治理上的挑战,经合组织为各国政府提供交流政策经验的场所。
- ② NFL即美国国家美式橄榄球大联盟;NBA即美国国家篮球协会;MLB即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NHL即美国冰球联盟;MLS即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
- ③ 援引中央电视台新闻台12月25日新闻调查节目“体校里的青春”的观点。

参考文献:

- [1] Dunning E. Sport matters: sociological studies of sport, violence and civilization[M]. London: Routledge, 1999.
- [2] 任海. 论奥运会对举办城市和国家的影响[D/OL]. 国家体育总局官方网站, 政法司理论处, 2006-11-26.
- [3] Kurkjian Tim. America's game[M]. Crown Publishers, 2000.
- [4] Leitner H. Cities in pursuit of economic growth: the local state as entrepreneur[J]. Political Geography Quarterly, 1990(9): 146-170.
- [5] Michalis Kavaratzis. From city marketing to city branding: toward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developing city brands[J]. Place Branding, 2004, 1(1): 58-73.
- [6] John Hannigan. Fantasy city[M]. London: Routledge, 1998.
- [7] Misener, Mason. Creating community networks: can sporting events offer meaningful sources of social capital?

- [J]. *Managing Leisure*, 2006, 11(1): 39-56.
- [8] Gildea William. At the end of century, hundreds of heroes: through the years, sports entertained and defined america[N]. *The Washington Post*, 1999-12-31.
- [9] Chris Gratton, Ian P Henry. Sport in the city: the role of sport in economic and social regeneration[M]. London: Routledge, 2001: 35-46.
- [10] Bruce K Johnson, John C Whitehead. Value of public goods from sports stadiums: The CVM approach[J].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2000, 18(1): 48-58.
- [11] Sala O E, Paruelo J M. Ecosystem services in grasslands[N]. *G Daily*, 1997: 237-252.
- [12] Cochrane A Peck, Tickell A. Manchester playing games. exploring the local politics of globalization[J]. *Urban Studies*, 1996(33): 19-36.
- [13] Baade R A, Dye R. The impact of stadiums and professional sports on metropolitan area development[J]. *Growth and Change*, 1990, 21: 1-14.
- [14] Baade R A. Professional sports as catalysts for metropolitan economic development [J].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1996(18): 1-17.
- [15] Noll R, Zimbalist A. Sports, jobs and taxes: The economic impact of sports teams and facilities[M].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7.
- [16] Coates D, Humphreys B R. The growth effects of sport franchises, stadia, and arenas[J].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1999, 18(4): 601-624.
- [17] Johnson B K, Whitehead J C. Value of public goods from sports stadiums: The CVM approach [J].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2000, 18(1): 48-58.
- [18] Malfas M, Theodoraki E, Houlihan B. Impacts of the Olympic Games as mega-events[J]. *Municipal Engineer*, 2004, 157: 209-220.
- [19] Hiller H. Impact and image: the convergence of urban factors in preparing for the 1988 Calgary Winter Olympics[M]. Avebury, 1998: 119-131.
- [20] Baade R, Matheson V. The quest for the cup: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the World Cup[J]. *Regional Studies*, 2004, 38(4): 343-354.
- [21] Chapin T. Beyond the entrepreneurial city: municipal capitalism in San Diego [J].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2002, 24(5): 565-581.
- [22] Coates D, Humphreys B. The growth effects of sports franchises, stadia, and arenas[J].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1999, 14(4): 601-624.
- [23] Keating Raymond J. Sports pork: The costly relationship between major league sports and government[J]. *Cato Policy Analysis*, 1999: 339.
- [24] Bernstein M F. Sports stadium boondoggle [J]. *Public Interest*, 1998(132): 57.
- [25] Thornley A. Urban regeneration and sports stadia,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J]. *Cato Policy Analysis*, 2002, 10(7): 813-816.
- [26] Wilbur C Rich. 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sports facilities[M]. Greenwood Publishing, 2000: 5.
- [27] Bowers Stephen R. Contrast and continuity: honecker's policy toward the Federal Republic and West Berlin[M]. Faculty Publications and Presentations, 1976: 86.
- [28] Palm J. Sport for all: Approaches from utopia to reality[M]. Germany Hofmann: Schorndorf, 1991.
- [29] Annette Zimmer. A nation of joiners: sports clubs in Germany[M]. AICGS Transatlantic Perspectives, 2010: 3.
- [30] Maassoume Barghchi. Cities, sports facilities development and hosting events[J].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009, 10(2): 185-19.
- [31] Suzuki N. Sports and neighborhood regeneration: exploring the mechanisms of social inclusion through sport[D]. Glasgow: University of Glasgow, 2007: 11.
- [32] Roche M. Mega-events and modernity: Olympics and expos in the growth of global culture [M]. London: Routledg, 2002: 169-172.
- [33] Chapin 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ports facility location: an end of the century review and assessment[J]. *Marquette Sports Law Journal*, 2002(2): 361-382.
- [34] Gábor Kozma. The use of sport in place branding activity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of Debrecen(Hungary) [EB/OL]. www.regional-studies-assoc.ac.uk, 2010.